

史學文丛



K2

00

K2
40
:1

史 学 文 丛

第 一 辑

西北民族学院历史系民族研究所 编

一九八三年二月 • 兰州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随着形势的发展，适应实际的需求，为了给西北各省区少数民族人民，培养从事历史专业的教学和科研人材，西北民族学院于一九八〇年创办了一个新的学系——历史系。

由于建系时间不长，教师人数不多，再加办学经验不够，因此，一切都在草创，事事都须摸索，面临的问题不少。但是，全系教职工群策群力，艰苦创业，在克服困难中坚持前进，迄今已经走过了三年的路程。

回顾这一段历程，尽管条件不足，作为不大，成就不多；但是，毕竟辟荆斩棘地踏出了一条路子，尽力而为地做下了一点事情。这本“文丛”的编印，就从侧面反映了这一事实。

我系教师本来人力单薄，他们既要开授系内的专业课，又要承担外系、科的公共课；在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他们还挤出时间，花出精力，积极从事结合专业的科学研究。三年来，陆续写出一些史学论文，大多都在院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

现在，我们把这些已发表的文章，搜集起来，辑印成册，取名《史学文丛》，呈献给读者。它的意图在于：既作为对我系教师教学和科研成果的一次检阅；又作为给我系教师学习和交流提供的一块“园地”；同时，也想把这些文章集中刊载，征求和听取院内师生、院外同业以及广大读者的批评指教，借以集思广益、修改提高；当然，更重要的是，我系作为史学领域的新阵地、史学战线上的新兵，为四化的史学科学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作点微薄的贡献。

我们对这册“文丛”赋予了重任，寄予了希望。但是，可以预计，限于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这些文章质量不会太高，内容也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而我们仍然不计工拙、不怕献丑；因为，它毕竟是辛勤劳动的果实，刻苦钻研的产物，同时大多还是中青年教师的成品。对于他们，尽力支持、扶植并推上业务第一线经受锻炼，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如同栏目所列表的，“文丛”的文章，大致包括中国史、世界史、宗教史特别是民族史几个方面。又如封面所标明的，这一本“文丛”是“第一辑”，之所以列出辑数，是因为我们设想，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将争取不定期地连续编印下去，接着能出版第二辑、第三辑……

一九八三年开始了。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在党的十二大精神鼓舞、院系党组织正确领导、有关方面大力支持以及我系全体师生积极努力下，再接再厉，使我系教学和科研能在现有基础上，迈开改革步，“更上一层楼”；使这个“文丛”，不断改进，发挥它史学战线一个新兵的作用，为开创史学领域的新局面作出更多的贡献。

编 者

一九八三年元月

史学文丛(第一辑)目录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 中国史 •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

.....郭卿友(1)

沙皇俄国对辛亥革命的破坏.....饶以诚(13)

实事求是地评价宋景诗.....吴万善(24)

试论南宋的营田.....汤开建(37)

“支那”名义考原.....关意权(56)

《续资治通鉴》成书初探.....王继光(76)

有关《金史》成书的几个问题.....王继光(101)

• 民族史 •

维吾尔族族源问题札记.....张 炼(114)

《隋书》之附国即早期吐蕃(悉勃野)

.....孙尔康 唐景福(144)

史 学 文 丛

北宋王朝与西北吐蕃之关系……………孙尔康 (155)

——兼评熙河之役

张澍《西夏姓氏录》订误……………汤开建 (171)

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胡斯操 (189)

角厮罗家族世系考述……………汤开建 (200)

1862—1873年的西北回民起义……………吴万善 (211)

• 世界史 •

论法国大革命的吉伦特派……………贾东海 (226)

试论雅各宾的恐怖政策……………谭 海 (237)

• 宗教史 •

本教初探……………孙尔康 (250)

略论基督教的起源、性质及其发展……………贾东海 (269)

• 史论 •

关于爱国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郭卿友 (279)

暴力革命是普遍规律吗? ……………贾东海 (301)

——兼谈社会过渡的道路和方式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 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

郭卿友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的杰出的历史功绩不仅在于他领导了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而且还在于他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坚持了民主革命的立场，并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从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新三民主义，使他的晚年思想大放异彩。本文现就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做一初步探讨。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继续（1912年1月——1919年4）

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曾一度陷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迷梦

中，误认为满清推倒了，民国建立了，革命就算成功了，“目前唯一的急务是办理实业”。正是抱着这种幻想，他于一九一二年四月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接受了袁世凯给他的“全国铁路督办”的任命。欣然去日本考察，决心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但宋教仁遇刺的枪声惊破了他的迷梦，使他认清了袁世凯的真面目，于是掀起了反袁的武装斗争，并提出了**打倒一切“谋危民国者”**的口号。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继续推行**独裁卖国政策**，他又同西南的滇桂军阀联合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揭起“护法”大旗，公开与北洋军阀政府对抗。这说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之后，继续坚持民主革命，反对北洋军阀。然而这些革命都只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并没有超出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范畴，它表现了孙中山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以下几个严重弱点。

第一、没有举起反帝的旗帜。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先生长期不能认清帝国主义的本质。他的旧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只限于反满革命，因此辛亥革命之后，便失去了目标。一九一四年七月，他在中华革命党的总章中规定“以实现民权、民主两主义为宗旨，”放弃民族主义，闭口不谈反帝，表现了他对帝国主义继续持有幻想。第二、反封建斗争不彻底。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提不出新的革命纲领，而只以“讨袁”和“护法”为旗帜，他只同这一部分封建势力划清了界线，而不能同另一部分封建势力划清界线；只重视国体，而忽视了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不懂得旧的封建势力完全可能新的国体内复辟。事实上当时的《临时约法》在军阀手里已成了一张废纸，而国会则成了官僚、政客卖身求荣的场所，它们在人民群众心中早已声名狼籍。因此，“护法”的口号并没有起到动员群众的作用。第三、执行了一条脱离群众的军事路线。没有建立和掌握一支可靠的革命军队这是辛亥革命流产的重要原因，孙中山迟迟没有认真总结这一教训，他在辛亥革命后所策动的几次讨袁武装起义，继续重

蹈了以前的单纯军事暴动的旧路；在“护法”战争中，又转而走向“依靠军阀打军阀”的错路，把革命胜利寄托在少数革命党人和军事领袖身上，没有找到革命所依靠的力量。正是这条旧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注定了他在辛亥革命后所领导的“讨袁”与“护法”运动的失败。一九一八年五月，他被西南军阀抛弃，这才认识到“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

①但如何革命，却找不到出路。他在遂后出版的《建国方略》一书中提出了“知难行易”说，把革命的成败归结为“心之为用”，把群众划分为“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类，陷入了主观唯心论，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孙中山的“讨袁”、“护法”运动的失败和他的悲观苦闷，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破产。

觉醒、探索、徘徊（1919年5月——1922年7月）

在这个阶段，孙中山先后遇到了十月革命、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新鲜事物，并在它们的推动和影响下，开始了新的觉醒，努力探索中国革命的新的道路。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孙中山当然不可能对十月革命一开始就有本质的理解，但他在屡遭失败的苦闷中，却从十月革命的胜利得到了启发和鼓舞。特别是苏俄政府在十月革命后多次声明废除帝俄时代与中国签定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一切特权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友谊，更在他的心中燃烧起振兴中华的新希望。一九一八年五月，他在给列宁和苏俄政府的信中说：“中国革命党对贵国革命党所进行的艰苦奋斗表示十分钦佩，并愿中俄两党团结一致，共同奋斗。”②当时的《民国日报》也不断地报道十月革命的消

息，表现了他对十月革命的同情和向往；一九二一年八月，他又在致苏俄外长齐契林的信中表示：“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组织、你们的军队和教育组织。”^③与此同时，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也十分关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共产国际代表威经斯基来到中国，经陈独秀介绍与孙中山在上海会见，详细介绍了十月革命的情况；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又经李大钊介绍与孙中山在桂林会见，并就中国革命问题向孙中山提出了两点建议：一是要有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二是要办军官学校，创立革命武装。孙中山听后非常高兴，深信“吾国今日之军人，倘亦具有主义及目的之决心改造新中国，其效果必在俄国之上”。^④从而得出了中国革命“应效法俄人”、“以俄为师”^⑤的结论。这表明他在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但当时他又不敢马上与苏俄结成联盟，怕公开与苏俄接近引起列强的干涉。说明他对帝国主义仍有幻想，没有下定“联俄”的决心。

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一九一九年五月，中国爆发的五四运动，也推动了孙中山的觉醒。他从五四运动中看到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威力，感慨地说：“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论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⑥遂把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并指派廖仲恺、朱执信在上海创办了《建设杂志》和《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以“激揭新文化之波澜，灌溉新思想之萌芽，树立新事业之雏形。”^⑦表明了他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推动之下奋起的决心。

与孙中山觉醒的同时，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等人为代表的一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迅速成长起来，他们举起了马克思主义旗帜，做为改造中国的武器，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基础上，于一九二一年七月创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指明了新的方向。中国共

共产党的成立和孙中山的觉醒，是十月革命在中国产生的两个积极后果，也是辛亥革命之后，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壮大而推动中国民主革命向前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当时的苏俄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国共两党的发展都寄以无限的关怀。一九二二年一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同时邀请了中国国、共两党派代表参加，这次大会指明了中国革命反帝反封建的性质，并确立了建立反帝民主联合战线的策略思想，这对中国革命以后的发展以及国共两党民主革命纲领的形成，起了重大的影响。会议期间，列宁曾接见了中共代表张国焘和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并提出了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⑧会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苏俄代表达林先后来到中国，与国共双方商洽，以期实现国共合作。但当时国共双方对这一问题持有不同意见：一九二二年四月，在中共召开的广州会议上，多数同志赞成合作，但主张“党外联合”，反对共产国际提议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而当时孙中山又主张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反对“党外联合”。因此，当达林提出两党合作时，孙中山表示拒绝。^⑨说明他当时还没有下定“联共”的决心。

正因为这样，孙中山先生在探索与徘徊中，又走了一段弯路。一九二〇年八月，他命令粤军陈炯明驱逐了桂系军阀岑春煊和陆荣廷，遂后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再次揭起“护法”的旗帜，并积极策动北伐。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亲手培养的陈炯明和其他军阀一样靠不住，竟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勾结帝国主义发动了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率部反击失败，于同年八月流亡上海，再次陷入了绝望与孤独之中。

第二次“护法”的失败，是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尾声，也是他依靠军阀打军阀革命路线的彻底破产。值此，他才在探索与徘徊中猛醒，毅然接受了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开

始了他革命的生涯中最伟大的转变。

伟大的转变（1922年8月——1923年12月）

一九二二年八月，正当孙中山在上海陷入孤独和绝望的时候，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现在我们来揭示一下这些历史事件与孙中山思想转变的联系。

同年六月，即在陈炯明发动武装暴乱的前夕，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批判了吴佩孚的“武力统一”、陈炯明的“联省自治”和胡适的“好人政府”的政治主张，指出中国社会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议国共两党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主联合战线；《主张》一方面赞扬了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比较是革命的民主派”，一方面又对他“对外有接近一派帝国主义倾向，对内两次与北洋军阀携手”的错误进行了善意的、中肯的批评，指出“这种动摇不定的政策、实有改变的必要。”^⑩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响导》也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号召孙中山“一面与民众为亲密结合，一面与苏俄为不二的同盟，大着胆子明白地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两种恶势力。”^⑪

同年七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并确立了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斗争策略。同年八月上旬，中国共产党又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杭州召开了专门研究国共合作的特别会议，决定了以共产党员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形式来推动国共合作的实现。这样，中共的杭州会议，就成了国共两党合作的起点。遂后，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张太雷、蔡和森等人先后在上海与孙中山会晤，洽商国共合作“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之问题。”^⑫孤独苦闷的孙中山，此时得到了共产党人如此真挚的帮助，非常兴奋。特别是他与李大钊的会见，更是

“畅谈不厌，几乎忘食。”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宣言和直接会谈的帮助与推动之下，他开始了一生的伟大转变，找到了革命的新方向。他从共产党人身上吸取了革命的力量，欢迎国共合作。他说：“在斗争中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⑬同年八月，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先后加入了国民党，开始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国共两党的合作。

与此同时，苏俄副外长越飞也于同年八月来到中国，就中国革命和中俄关系问题与孙中山进行了深入地讨论，翌年一月，在上海发表了《孙文与越飞联合宣言》。《宣言》指出：“中国最要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业……可以俄国援助为依靠也。”^⑭这个《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确立。遂后，他又派出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去苏联考察，学习苏俄成功的经验，同时还邀请了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特别顾问，帮助他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武装。他一再重申：“今天的革命非学俄国不可”，中国革命只有“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和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⑮

“联俄”、“联共”政策的确立，推动了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决心。他在回答宋庆龄提出的为什么要吸收共产党、改组国民党的问题时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为了党是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又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挽救它就需要新血液”^⑯他决心吸取共产党人的新血液来促使国民党的新生，从一九二三年九月起，连续在上海三次召开国民党中央和各省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改组国民党问题；同年十月，成立了有共产党人李大钊参加的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十一月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新党章草案，正式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时，国

国民党虽然是一个号称拥有五十万党员的大党，但由于它的组织散漫、成份复杂、政见不一造成改组工作的严重阻力。就在孙中山公布改组宣言的当天，国民党的右派邹鲁、张继、居正、冯自由、邓泽如等人，联合提出了弹劾共产党案。他们造谣诬蔑国共合作是共产党“隐其阴谋”、“联俄”会引起帝国主义的干涉。孙中山对此立场坚定，毫不退让，他严正指出：“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啊！”又说“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自己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①⑦}至于帝国主义干涉问题，孙中山指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吾党。所望同情只有俄国”^{①⑧}孙中山为了振兴中华英勇奋斗了几十年，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经受了无数的失败和挫折，终于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找到了革命的依靠力量，完成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转变。

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光辉（1924年1月——1925年3月）

一九二四年一月，中国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在这个《宣言》中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中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并根据三大政策的精神，对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在《宣言》中解释说：“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并在“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这样，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就从旧民族主义的反满革命升华到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高度。

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在《宣言》中不但强调了“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而且

还提出了民主专政的思想：“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一切自由及权利；而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和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①⑨}这就比他在旧民权主义中所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空洞口号，具有更深刻的革命内容。

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提出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及具体实施办法。稍后，他又进一步提出了“耕者有其田”、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谋求改善工农生活的主张。这比旧民生主义的“平均地权”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

国民党一大《宣言》使旧三民主义发生了质的飞跃，获得了崭新的革命内容，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与三大政策紧密相连的三民主义。“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②⑩}这种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二大所提出的民主革命纲领内容基本相同，因此，它就成为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成为大革命时期革命统一战线的一面旗帜。

孙中山对国民党一大《宣言》非常重视，把它看成“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地的举动。”他的伟大之处，不仅在理论上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纲领——新三民主义，而且还在实践上以百折不挠、坚贞不屈的斗争精神积极贯彻这个纲领，使他成为一个杰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

他的晚年的革命思想，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坚决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斗争。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夕，孙中山就向北京外交使团提出了收回粤海关主权、截留两广海关关税余额的严正要求，这是他一生中公开向帝国主义进攻的开始；遂后，他又在一九二四年十月以革命的武力镇压了英帝国主义所支持的广州商团的武装叛乱。他在《为广州商团事件

对外宣言》中愤怒指出：“从前有一个时期，为努力推翻满清；今将开始一个时期，为努力推翻帝国主义之干涉中国，扫除完成革命之历史工作之最大障碍。”^{②①}同时，他在声讨吴佩孚的《北伐宣言》中说：“此战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翻军阀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并代表中国人民第一次提出了“从新审定一切不平等条约，即取消此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切特权，以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之势力。”^{②②}“北京政变”之后，他为了“拿革命主义去宣传”，抱病北上。他在《北上宣言》和途经上海、日本、天津发表的一系列讲演中，一再重申了他反帝反封建的原则立场。他指出：“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只有打破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②③}他告诫中国人民，要帝国主义“和平退回我们的权力，那就象与虎谋皮”。^{②④}直到他在弥留之际，还在昏迷中不断呼喊：“奋斗……救中国”。留下了“必须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遗嘱。孙中山在他革命的一生中饱尝了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玩弄和欺骗的苦痛，晚年终于认清了这两个凶恶敌人的本性，并高张革命大旗，勇猛向前冲杀。他不愧为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民族英雄。

第二、创办新式革命武装，提出人民军队思想。一九二四年五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在广州创办了黄埔军校。他在军校开学典礼上说：“中国革命所以迟迟不能成功的原因，就是没有自己的革命军队，没有广大人民为基础。”^{②⑤}表明了他对革命武装的重要性有了清醒地认识，彻底否定了他过去单纯军事暴动和依靠军阀打军阀的错误军事路线。黄埔军校以苏联红军为榜样，建立了党代表和政治工作制度，并聘请共产党人来校工作，成为一所新型的革命学校，奠定了革命武装的基础。^{②⑥}正是有了这支新型的革命武装为后盾，孙中山便一反过去的被动

地位，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他依靠革命武装和人民的支持，先后镇压了广州商团和滇桂军阀的叛乱，后来又取得了东征的胜利，建立和巩固了两广革命根据地，推动了北伐战争的发展，形成了大革命的高潮。更为可贵的是他在晚年还提出了人民军队的思想。他说：“今日以后，当划一国民革命之新时代。使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之现象当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的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国民之武力。”^{②6}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孙中山的一生只能作到“武力与国民相结合”，而没有实现“武力为国民之武力”。但是，他在建军上的光辉思想，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人民军队的历史借鉴。

第三，扶助农工，发展工农运动。孙中山先生在晚年积力贯彻“扶助农工”政策。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上曾说：工农“因其所处之地位与所感之痛苦，类皆相同，其要求解放之情，至为迫切，则其反抗帝国主义之意，亦必至强烈。故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参加，然后可以决胜，毫无可疑者。”^{②7}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建立了工人部和农民部，做为领导工农运动的机关。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主持召开了广州工人代表大会。孙中山到会讲演，鼓励工人做“国民先锋”；同年七月，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又主持召开了广东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孙中山看到赤脚破衫的农民从远地赶来开会，非常感动，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同时国民党中央农民部还创办了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孙中山在开学典礼上说：“农民是我们中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革命没有基础。”^{②8}他先后任命彭湃、阮啸仙、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为讲习所的所长，为中国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领导骨干。由于孙中山先生努力贯彻“扶助农工”政策，国共合作的广东革命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工农运动最发达的地区，全省二十二个县建立了农会组织，并建立了工